

鲁迅的花与树

钱振文

—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

因为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百草园”成为儿童成长过程中隐秘空间的代名词。这个隐秘空间往往主要是由植物的形象、色彩和味道构成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儿童时期的“百草园”，有对“百草园”中某几种植物的深刻记忆。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上云端去了。”

这是鲁迅对百草园的回忆。因为这段简洁而精准的描写，我们深深地记住了这棵“高大的皂荚树”。皂荚树在北方不是常见的树种，但我有两次看见了皂荚树。一次是在太行山上的一个小山村；一次是在北京植物园。因为可以从树底下捡拾到掉下来的豆类，因此皂荚树是很引人注意的。这两个地方的皂荚树的确都是很高大的。

喜爱植物大概是人的天性。但根据美国人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在《植物的欲望》中的说法，一个人对花木无动于衷也是可能的。一种情况见于抑郁症的前兆“花神倦怠”症，另一种情况就是“处在一定年龄的男孩也可能对于花不感兴趣”。他所说的“一定年龄”指十岁左右。迈克尔·波伦说，十岁的他喜欢的花是南瓜优美的喇叭花、草莓漂亮的小带花，这些花都是“有意义的花，是可以预告一种果实将要到来的花”。但他并不喜欢其它的花，“为花而花”的花。但十岁左右的鲁迅却喜欢养花，养纯粹的“为花而花”的花。那时候，鲁迅正在绍兴老家的三味书屋读书。在业余时间，鲁迅喜欢做的两件事情，一是看“花书”，就是有画的书；二是种花。“看‘花书’”还算普遍的爱好，每个时代的孩子们都爱好看“花书”。鲁迅看“花书”，不光是看，还照着描画，就是用一种又薄又透的“荆川纸”覆盖在花书上，把下边的图案很逼真地影写下来，然后装订成册。鲁迅的第二种爱好则不太一般了。周建人在《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中回忆说：鲁迅“空闲时也种花，有若干种月季，及石竹，文竹，郁金香，映山红等等，因此又看或抄讲种花的书，如《花镜》，便是他常看的。他不单是知道种法，大部分还要知道花的名称，因为他得到一种花时，喜欢盆上插一条短竹签，写上植物的名字。”不但种花，还要弄清和标记各种花的名称，这看起来的确不像是一般幼儿的玩儿。所以周建人说：“鲁迅先生小的时候，玩的时间非常少，糊塗甲，种花等，可以说玩，但也可以说不是玩，是一种工作。”

鲁迅到南京水师学堂学习自然科学是在1898年春天。从他作于这年的笔记小品《蔓草杂记》和《蒔花杂记》，可见鲁迅年轻时候生活趣味的广泛和对植物学的爱好。如《蒔花杂记》中对晚香玉的记述：

“晚香玉本名土猷嫫斯，出塞外，叶阔似吉祥草，花生穗间，每穗四五球，每球四五朵，色白，至夜尤香，形如喇叭，长寸余，瓣五六七不等，都中最盛。昔圣祖仁皇帝因其名俗，改赐今名。”

二

1902年2月，鲁迅到日本留学，先是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根据鲁迅好友许寿裳的回忆，鲁迅在弘文学院学习期间，依然延续着幼年时期对植物的喜爱。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他在弘文学院时代，已经买了三好学的《植物学》两厚册，其中着色的插图很多。所以他对于植物的培养有了相当的素养。伍舍的庭院既广，隙地又多，鲁迅和我便发动来种花草，尤其是朝颜即牵牛花，因为变种很多，花的色彩和形状，真是千奇百怪。每当晓风拂拂，晨露湛湛，朝颜的笑口齐开，作拍拍的声响，大有天国乐园去人不远之感。傍晚浇水，把已经开过的花蒂一一摘去，那么以后的花轮便会维持原样，不会减小。”许寿裳说到的“伍舍”是鲁迅1908年在东京租住过的一处住屋。因为是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钱均夫、朱谋宣等五个人共住，所以叫作“伍舍”。巧合的是，在鲁迅他们五个中国留学生之前，租住过这个“伍舍”的曾经还有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1906年春天鲁迅从仙台医专肄业、回东京组织文艺运动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情。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回忆和藤野先生告别时候的对话是很著名的：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没有人十分在意鲁迅在这里所说的“我想去学生物学”这句话，仅把

它当做是鲁迅为放弃医学随便找到的一个借口。但实际上，到日本留学后，鲁迅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发生了明显的转移，即从地质、化学等无生物学向植物学、动物学、医学等生物科学的转移。如果不是因为有更高的志趣，鲁迅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生物学家。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藏书室收藏了11本德语植物学著作，如《植物类别之判断》、《普通植物学》、《植物采集者》（采集和制作植物标本的指南）、《隐花植物——海藻、菌类、地衣、苔藓、羊齿类植物》、《开花植物体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所产苔藓类与蕨类植物目录》、《植物观察入门》、《食肉植物》等。从这些书的出版年份看，应该都是鲁迅在日本读书期间购买的。因此，即使如鲁迅所说，在告别藤野先生的时候，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但鲁迅的话也并非仅仅是给人慰安的谎话。生物学尤其是植物学的确是他游览重要的知识兴奋点。1909年6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应许寿裳之约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学 and 化学教员，同时，给日本教师铃木圭寿的植物学课程做课堂翻译。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中说到民元时代作为科学家的鲁迅时说：“他在杭州时，星期日喜欢和同事出去采集植物标本，徘徊于吴山圣水之间，不是为游览而是为科学研究。每次看他满载而归，接着做整理，压平，张贴，标名等等工作，乐此不疲，弄得房间里堆积如丘，琳琅满目。”一年多以后，鲁迅回到绍兴，在绍兴中学堂担任生理学教员兼监学，业余时间继续研究植物学和采集植物标本。《辛亥游录》是鲁迅在1911年撰写的游记小品，记录了他两次采集植物标本的详细过程，其中的一次是：

“三月十八日，晴。出稽山门可六七里，至于禹祠。绿萝缘墙，败稿布地，二三人坐阶石上。折而右，为会稽山足。行里许，转左，达一小山。山不甚高，松杉駢立，求木棘尤。更上则木亦渐少，仅见卉草，皆常品，获得两种。及巅，乃见小花，五六成簇者可数十，积广约一丈。撮其近者，皆一叶一花，叶碧而花紫，世称一叶兰；名叶以数，名花以类也。”

三

1912年5月，鲁迅随教育部来到北京。生活和工作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初到北方的鲁迅对北京的风景是很敏感的。1912年5月5日是他到北京的第一天，从这天的日记可以看出他对北方的风景是很失望的：“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发车，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赏。”但等到秋冬的时候，在北京住过几个月的鲁迅开始体会到北京的独特风情。1912年10月27日日记载：

“夜微风，已而稍大，窗前枣叶簌簌飘落如雨。”1913年1月15日日记载：“晨微雪如絮缀寒柯上，视之甚美。”在新的工作环境中，鲁迅没有继续过去的植物学研究。但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这件事情就是他曾经多次游览万牲园。如1912年5月19日“与恂士、季市游万生园。”1916年4月16日“午后得铭伯先生柬，午后同游农事试验场，”1917年10月20日“上午季市来，并同二弟游农事试验场。”1919年11月19日“上午同重君、二弟、二弟妇及丰、谧、蒙乘马车同游农事试验场，”1920年4月25日“午后同母亲、二弟及丰游三贝子园。”鲁迅日记中的万牲园、农事试验场、三贝子园是一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北京动物园，但那时候的万牲园并不只是动物园，其中的大半部分还是植物园和农作物试验场。鲁迅并不喜欢旅游。除了中央公园，这个万牲园是他游览最多的地方，由此可见鲁迅的趣味所在。

在北京的鲁迅没有继续研究植物学，但却又有条件像小时候一样亲手栽种各种花木。种植花木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要有属于自己的院落。但鲁迅在大多数时候的住房都是配给和租住的。除了在绍兴老家生活的18年，鲁迅拥有自己住宅的年份都在北京。

1919年11月21日，鲁迅和二弟周作人一家从绍兴会馆搬到了北京新街口八道湾11号，这里是他们弟兄卖掉绍兴祖宅后合力购买的新居。八道湾11号是个有三进院落的标准四合院，院子空地很大，树木繁多。根据周丰二作于1987年的一幅八道湾11号示意图，1920年代的八道湾11号院子里共有大小树木48棵。这些树木有的是原来就有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鲁迅种植的。

1923年7月，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8月初，鲁迅从八道湾11号搬到砖塔胡同61号暂住。几个月后，鲁迅购买了阜成门西三条21号。因为原来的房屋已经破旧不堪，鲁迅拆掉了这里的旧屋并重新设计建设了新屋。1924年春天，鲁迅搬到了崭新的西三条21号。鲁迅刚搬家过来时，院子里还是光秃秃的，所有的植物只是前院的一棵枣树和后院的一棵杏树。不过，鲁迅对如何绿化这个自己亲手打造的宅子早有系统的想法。1924年6月8日是鲁迅搬来新居的第二个星期天，正在北京女高师读书的绍兴小老乡许羨苏、王顺亲和原来一起在砖塔胡同61号居住的俞氏三姐妹俞芬、俞芳、俞藻一起来西三条看望鲁迅先生，鲁迅兴致勃勃地带领他们参观自己的新居，顺便介绍了自己在前后院种树的规划：前院打算种植紫白了香各两株、碧桃树一株、榆叶梅两株，后院的土质不如前院，“打算在北面沿北墙种两株花椒树，两株刺梅，西面种三株

白杨树。白杨树生长力强，风吹树叶沙沙响，别有风味。”（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因为过了最好的植树季节，直到第二年春天，鲁迅的种树计划才得以落实。1925年4月5日是植树节，鲁迅请著名的花木店云松阁来家种树。这天的鲁迅日记有“云松阁来种树，计紫、白丁香各二，碧桃一，花椒、刺梅、榆梅各二，青杨三。”北京解放后，在西三条21号院的基础上建设了北京鲁迅博物馆。如今，鲁迅种植的树木大多数都死掉了，如碧桃、刺梅及两株紫丁香和三棵白杨树，但正房前的两株白丁香却还好好活着，树干遒劲，树冠如盖，成为这个小院最引人注意的景观。

西三条21号院在很多方面都延续了八道湾11号院，包括房屋的结构和树木的种类。在八道湾11号，鲁迅就曾在前院自己的住房外种植了两株丁香和一株白杨。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常惠回忆当年拜访鲁迅的经过时有一段关于杨树的回忆。他说：“他把我们让进屏门外南屋，这是先生的书房，又坐下来谈话。过了一会儿，就听院子里响起哗啦啦的声音，我们赶紧站起来告辞说：‘坐的时间久了，把雨都等来了。’先生笑了起来，说：‘这儿是雨呀！你们没有见屏门外那棵树吗？是树上叶子响。那是棵大叶杨，叶子大，刮小风就响，风大了响声更大，像下雨一样。这棵树是我栽的，大叶杨有风就响，响起来好听，我喜欢这树。’”（常惠《回忆鲁迅先生》）对这棵“有风就响”、“响起来好听”的白杨树，章廷谦也曾说过：“以前在八道湾住宅的室前，有一棵青杨，笔挺的耸立在院中，俯瞰众芳，萧萧作响的，就是他所栽种也是他所心爱的。”（川岛《鲁迅先生生活琐记》）

白杨树不仅是鲁迅心爱的树，也是周作人喜欢的树。周作人1930年写过一篇《两株树》，其中也说到常惠和章廷谦回忆中的那株白杨树：“树木里边我所喜欢的第一种是白杨。小时候读古诗十九首。读过‘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之句，但在南方终未见过白杨，后来在北京才初次看见。”不过，在《两株树》中，周作人却说是他在前院种植了一棵白杨树：“我在前面的院子里种了一棵，每逢夏秋有客来斋夜话的时候，忽闻淅沥声，多疑是雨下，推户出视，这是别种树所没有的好处。”其实，鲁迅和周作人、周建人兄弟早年和睦相处、感情甚笃。1901年4月，离家在外读书的鲁迅完成了《别诸弟三首》，其中第二首写到了兄弟几人在家乡度过的共同侍弄花草的天伦之乐：“日暮停舟老圃家，棘篱绕屋树交加。怅然回忆家乡乐，抱瓮何时共养花。”如此看来，八道湾的这棵杨树很有可能是鲁迅兄弟一起种植的。



魏晋七士子

（国画）

韩 硕

“说破”的艺术

陈 益

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理查二世》和《仲夏夜之梦》，也竭力将隐喻和象征转化为剧情发展的需要。

其实只要仔细想一想，我们就不难理解。昆曲演出最不容忽略的特征，是在厅堂铺设红氍毹，角色（演员）与观众近在咫尺，随时都可作交流。何况，很多戏文是根据主人的嗜好点的，伶人备有戏单，点哪出便演哪出（明清之际有不少家班，排戏演戏更理所当然地随从主人）。听戏者从情节到曲词都烂熟于心，甚至将传奇脚本放

在膝盖上，边看边听，随听随哼。戏已没什么秘密，干脆说破，反而能让观众接受。当然，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演技的高下才是获得赏银的关键。

也有自报家门说不破的剧目。例如《长生殿·春睡》，杨贵妃自报家门，称自己：“生有玉环，在于左臂，上隐‘大真’二字。因名玉环，小字大真”。人怎么可能一从娘胎出来臂上就有玉环呢？无疑很不可信。然而，洪昇正是要神化杨贵妃，以迎合观众的口味。这，也从一个侧面昭示了传

最近电视剧《半生缘》重拍，又掀起热议。我想起许鞍华导演的电影《半生缘》中，有一个细节剪裁很有意思。

曼璐跟母亲提出，曼桢在家里住着不好，应该趁年轻赶紧嫁人。母亲说曼桢不着急，你才着急，你都三十岁了。顺口又提到，她的初恋张豫瑾现在在家乡医院当院长了，还没有结婚，勾起了曼璐的回忆。少女曼璐与豫瑾分手，发生在豫瑾因为心情不好和人打架后，但电影中没有明说的的事实是，曼璐为了维持家计已经开始当舞女，年轻的豫瑾当然接受不了。曼璐对豫瑾说，我能有什么办法，我要赚钱养家。而后伴随着曼璐伤痛的表情，背景音出现了徐丽仙的弹词《情探》，“自与郎君分别，梨花落……”曼璐最后说，你自己保重，走向了小巷深处，她没有回头，镜头随即切换到牌桌，彼时已经是过气舞女的曼璐被旧恩客嫌弃。这段弹词三两句却贯穿这十年光景，几乎是桥接一般地，一点点变得清晰，曼璐带着不忿油滑地说，“哟王老板，怎么换了酒店也不告诉我……”谄媚的祝词才在一边给她倒茶。

我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曼璐与敦桂英命运的关联，倒是被导演的设置提醒了一下，想想觉得挺有意思。《情探》改编自明传奇《焚香记》，是一个著名的负心汉故事，不只是弹词，昆剧、越剧都有搬演，“阳告”一折恨意满满，又怨又沉重。故事说是落难公子“王魁”中了状元，当上乘龙快婿，停妻再娶，有了柔情蜜意的新娇妻，自然要打发患难时结交的妓女敦桂英。王魁用两百两银子发落旧爱，桂英泣诉无门自尽，世人都道桂英过于痴心，错付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自私郎君。也有人不禁探问，桂英都拿了两百两银子（分手费）了，为什么还要去死呢？难道她真的痴心妄想要当状元夫人吗？

越剧《情探》的传播则更加深入人心，细节刻画也更为生活化。所谓“情探”，说的是试探。桂英于两人盟誓的海神庙自尽之后，海神爷准了她的诉求，命判官引桂英鬼魂进京与王魁质证。桂英心软，不舍夫妻恩义，想以“情”试探，如若王魁还念及旧情就放过他，不料王魁负心绝情，甚至拔剑要杀她，桂英伤心欲绝，盛怒之下，活捉王魁。

越剧里桂英是怎么试探的呢？王魁寒窗苦读时，桂英一直在一旁为王魁缝制补子，王魁不理解，问，我已经有了很多袜子你为什么还要继续缝。桂英说，你晚上读书腿会冷，穿上你就不冷了，还带他去找医生治疗腿寒的疾病。桂英的丫鬟在一旁说，“明是非，知寒暖，苦心用尽”，可看作点睛。桂英的魂魄下凡试探时，她拿着一张旧药方，问王魁还记不记得这件事，王魁说这毛病我自考上状元后再也没有复发过。

我们印象中《半生缘》里的曼璐一直是一个反面角色，戕害妹妹，毁了曼桢与世钧的好姻缘。但曼璐为什么会下定决心，恐怕也与“情探”有关，探的是豫瑾。沦落风尘本是无可奈何之事，年老色衰时她深知祝鸿才也并非完美的托付。祝鸿才对妹妹早有歹意，这才是曼璐提出希望曼桢早点嫁人搬出去的原因，她一开始并没有想要当一个恶人，甚至因为嫉妒想要在生活场域里支开妹妹。

曼璐结婚后，事业有成的豫瑾来

持尺忽觉衡量难

——从《情探》到电影《半生缘》

张怡微

上海探望曼桢一家。家人觉得曼璐的婚姻问题解决了，那曼桢和豫瑾要是能在一起挺好，知根知底，豫瑾也对曼桢流露出好意，无奈曼桢早就心有所属，本来都是不大的事，却因为曼璐心中有愧，也因为她婚姻内部的问题，她执意要见一见这位旧情人，做一番“情探”，这才为后来的故事埋下伏笔。

曼璐穿着早年豫瑾觉得好看的衣服，满怀哀怨与期待地去与他重逢。没想到豫瑾因为在曼桢处受了挫，根本无心与她叙旧。曼璐说，“其实你不应该到这儿来的，难得来上海应该高高兴兴的。”豫瑾说，“以前的那些事就不要再提了，我听说你有一个很好的归宿，我也就放心了。”曼璐问：“你一定要走？”豫瑾说：“想起以前的一些事情，我就觉得非常幼稚，也很可笑，”而后曼璐突然发现了一本书，说“这不是曼桢的书吗？”豫瑾答：“对，是她送给我的。”听起来也是很普通的对话，却伤了曼璐的心。她穿着的旧衣服，却对不上眼前这个有情的人。和桂英拿着旧药方，见到的却是一个没有病的人是相似的。

戏曲中的敦桂英是一个痴心到偏执的女性，“我将心里儿没尽藏的倾他，意儿也满载的痴”，她的困境也正在于此，不相信人是会变的，要神明帮她维系这种不变，还要惩罚变化。但越剧中的敦桂英也有过茫然的时候，王魁赴京赶考已久，她又想给他做衣服，手里拿着一把尺，心下却很茫然，他到底是胖了还是瘦了呢？桂英于是自叹道，“持尺忽觉衡量难”，这又何尝不是感情的常态。

仔细想来，许鞍华能将这两位女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并映照得如此婉转贴切，令人赞叹。



“文汇报会”

微信二维码

统戏曲中娱神——娱人的性质。

《西厢记·游殿》一则，讲张珙与崔莺莺在普救寺一见钟情的故事，开篇却让滑稽和尚法聪大出了风头。法聪出场，自报家门道：“我做和尚不吃荤，大鱼大肉同圈吞”。不仅让自己底朝天，连方丈法本也凡心尽显。师徒二人联句，法本说：“静坐禅房深，忽然觉动情”，法聪回答：“休要出此语，隔窗有人听”；法本又说：“出家皆如此，休要假惺惺。开了聪明窍，好念法华经。”听他们的话语，哪里是身入空门？一连串台词，几乎就是《笑林广记》。诸如老虎也怕和尚的化缘簿，“周夫子”是“周仑的爷”等等，尽情张扬了世俗的情趣，恰恰又出自和尚法聪之口，对于假正经假道学的丑丑、嘲弄，丝毫也不怜惜。令观众开怀大笑以后思索，什么才是生活的本质？什么才是人性尊严？

法聪的说破，调侃、幽默、机巧，蕴含着一种苏州式幽默，自然而然地为张生在普救寺既充满感动又洋溢情

态地一跃粉墙，与崔莺莺约会，作出了铺垫。在戏中，丑角是以一口诙谐的苏白“说破”，小生则用自己的行动“说破”，生动地演绎了一个被爱情冲昏头脑，既聪明又愚蠢，既果敢又胆怯的书生形象。

明清传奇剧本的首出，往往是“家门大意”、“副末开场”。明人徐渭《南词叙录》“开场”条曰：“宋人凡勾栏未出，一老者先出，夸说大意以求赏，谓之‘开呵’。今戏文首一出，谓之‘开场’，亦遗意也。”如果说，开场是整出戏的说破，自报家门则是某个角色的说破。以昆曲为标志的中国传统戏曲，原本是为士大夫和有钱有闲者服务的，“观众至上”是根本的出发点。一个角色在大庭广众下毫不吝吝地解剖自己，甚至以讽刺、调侃、挖苦的方法，将性格、品行、志向作一番自我暴露，显然是最直接地赢得观众的欣赏。如今不少相声演员在表演时沿用了“说破”艺术，也颇见舞台效果。